

“进退有据”：当联盟体系遇到退出外交^{*}

李 冲 任 琳

【内容提要】 一国退出国际组织后其盟国是否会退出？现有理论在回答该问题时强调退出国实力与国际组织类型的作用，认为大国退出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后盟国大概率也会退出。但是相关研究未充分讨论退出国实力和国际组织类型作用方向相反时的情况，尤其是强国退出非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对盟国的影响。本文认为，一国的退出外交整体上会提升其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但盟国的政策也会受退出国与盟国意识形态差距和实力对比、退出国退出原因、国际组织议题范围等因素的调节，并提出效仿、追随与改革三种机制来解释盟国政策选择逻辑。当退出国与盟国之间意识形态接近时，盟国更可能效仿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时，盟国更可能追随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退出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时，盟国更可能推动组织改革。本文利用1945—2014年间国家退出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军事联盟数据，使用双重（三重）差分法和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并通过苏联和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展示上述三种机制。根据本文理论推断，在全球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思潮高涨，特朗普对盟国讹诈施压力度增强的背景下，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盟国配合美国“退群”。

【关键词】 退出外交 联盟 国际组织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李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lichong@cass.org.cn

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电子邮箱：renlin@cass.org.cn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5QQJH77）。文责自负。

一、研究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的数量、规模、功能整体上不断扩大,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①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主权国家普遍谋求加入国际组织,倾向通过国际组织实现外交目标。然而,以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Donald Trump)胜选为标志,近年来退出外交事件——国家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愈发频繁。^②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先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天空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协定与多边组织。^③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再度启动“退群”,陆续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面审查美国对联合国的参与和资金投入。^④不过,虽然退出外交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影响却存在不同看法。例如,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退群”会引发盟国效仿,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造成系统性打击,^⑤但也有观点指出,其他国家普遍对美国“退群”表示不满,不会效仿美国

① 刘莲莲:《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与理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2期,第9—41页;Kenneth W.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 “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1, 1998, pp. 3-32。

② 退出外交也称退群外交或退约外交,参见李志永:《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4期,第126页;王明国:《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1期,第61—62页。

③ 新华网:《新华国际时评:美国“退群”的新“境界”》,2020年5月30日,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5/30/c_1126054036.htm,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④ 新华网:《马斯克公开支持美国退出北约和联合国》,2025年3月4日,来源:<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2432370>,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⑤ 王文:《美国再掀“退群潮”威胁几何》,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第78—79页;欧洲时报网:《美国“退群”引发效仿 分析指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构成隐忧》,2025年2月7日,来源:<https://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international/2025-02-06/1337242011069190282.html>,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做法,而是选择加强合作,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①

各方对特朗普“退群”反应的不同,为讨论一国实施退出外交后其盟国选择的差异提供了基础。从实践上看,盟国的选择通常并不一致。例如,1935年巴拉圭退出国际联盟后,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委内瑞拉、秘鲁等拉美国家在随后几年陆续宣布退出。而在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2016年英国宣布退出欧盟后,北约和欧盟其他成员并未退出相应机构。从理论上,联盟并非总是铁板一块。^②虽然国家通常会抱有超过盟约文本的预期,希望尽可能地得到盟国支持,^③但盟国之间的政策分歧与机会主义背叛时有发生。莫莉·伯克迈尔(Molly Berkemeier)和马修·福尔曼(Matthew Fuhrmann)的研究发现,1816—2003年间国家履行联盟条约的比例只有50%;任琳与郑海琦也指出,在国家传统安全诉求减少、全球治理等功能性议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盟国基于“成本—收益”核算会对既有联盟关系做出调整,表现出选择性背离或选择性追随的“联盟异化”。^④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当一国实施退出外交后,为什么盟国有时会退出相关组织,有时却不会退出相关组织?^⑤ 本文认为,退出国的退出外交整体上会提升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在效仿、追随和改革机制影

① 新华网:《欧洲议会议员:美国“退群”给世界带来不安》,2025年2月13日,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213/5e701f2e75ec4e768026778a905b08dd/c.html>,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Creon Butler,“Europe Must Forge a New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27 March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03/europe-must-forge-new-role-global-economy>,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②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56-357.

④ Molly Berkemeier and Matthew Fuhrmann, “Reassessing the Fulfillment of Alliance Commitments in War,” *Research & Politics*, Vol. 5, No. 2, 2018, pp. 1-5;任琳、郑海琦:《联盟异化的起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第33—58页。

⑤ 下文将退出国际组织的国家称作“退出国”,将与退出国同属特定联盟和国际组织的国家称作“盟国”。

响下,盟国的政策选择受退出国与盟国的意识形态差距、实力对比,退出国的退出原因,国际组织的议题范围等因素调节。

二、为何退出国际组织:国家实力与组织类型

历史上国家退出国际组织、修正国际秩序的行为并不罕见,相关研究多从国际权力结构变迁、国内政治变革、国际组织类型、领导人特质等角度进行解释。^①重大的地缘政治变革,如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的结束,可能导致一系列行为体的出现与消亡。这一过程往往会有国家加入或退出国际组织。^②大国有时也会将退出作为制度性制衡手段,选择性地退出国际组织。^③同时,由于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将面对主权让渡和合作利益的权衡,因此如果一国认为在国际组织中主权让渡过大而合作收益过小,就会倾向于退出。^④国

① 宋伟:《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行为与国家》,载《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3期,第37—47页;参见李志永:《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4期,第128—132页;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4, No. 2, 2019, pp. 335-366.

②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1997, pp. 156-179;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Death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1815—2015,”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5, No. 2, 2020, pp. 339-370;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What Kill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When And Wh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erminat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7, No. 1, 2021, pp. 281-310.

③ 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84—115页;杨双梅:《制度竞争与国际领导权:拜登政府的国际制度选择》,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2期,第34—64页。

④ 凌胜利、王彦飞:《特朗普政府为何“退群”?》,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74—114页;李志永:《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第125—155页;Martin Richardson and Frank Stähl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Economic Sovereignty and Exi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20, 2019, pp. 1-29; Viona Rashica, “The Right, Procedures and Reasons of the Withdrawal of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EEU Review*, Vol. 14, No. 2, 2019, pp. 62-77.

家对参与国际组织的成本收益评估与该国内政治、领导人偏好以及国际组织类型相关。有研究发现,美国对国际组织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党派分歧,共和党选民更倾向于退出国际组织;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会驱动国家退出国际组织,具有反建制特征的领导人更可能启动“退群”;单方面退出综合性国际组织和条约时,退出国在对外关系、国际信誉等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① 不过,既有理论对“退出”本身的关注不够,没有详细讨论一国退出会对其他成员产生何种影响。在这一点上,因肯·冯·博尔济斯科夫斯基(Inken Von Borzyskowski)与梅特·艾尔斯特鲁普—桑乔瓦尼(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等人作了启发性的研究。博尔济斯科夫斯基强调退出国实力的影响,指出个别国家甚至多个国家的退出通常不会导致国际组织的解体,但如果是创始成员或经济强国退出则可能诱发其他成员退出,进而影响国际组织存续。桑乔瓦尼则关注国际组织的内部特征,认为与技术性组织相比,军事安全和司法类国际组织更容易因关键国家退出而解散。^②

盟国的政策有时是退出国与盟国协调的结果。因此,除国际组织相关

① 张旗:《特朗普的“外交革命”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载《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4期,第80—92页;查雯、李响:《外交政策突变原因探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74—118页;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4—37页;Seung-Whan Choi, “Nationalism and Withdrawals from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necting Theory and Data,”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7, No. 1, 2022, pp. 205-215;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Public Support For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U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9, No. 4, 2024, pp. 809-845; Averell Schmidt, “Damaged Relations: How Treaty Withdrawal Impac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9, No. 1, 2023, pp. 223-239.

②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p. 335-366;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When Do Member State Withdrawals Lead To The Death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0, No. 3, 2024, pp. 756-786;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What Kill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When and Wh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erminat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7, No. 1, 2021, pp. 281-310.

理论外,联盟理论也为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提供思路。^①正如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所言,“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意协调行动时,就会出现联盟”,“联盟意味着盟国之间承诺在未来进行协调。”^②当然,现实中联盟未必总是能形成一致政策,想得到盟国的配合与支持需要进行联盟管理。^③泉川康弘(Yasuhiro Izumikawa)将联盟管理方式概括为奖励(reward)与强制(coercive)两类。前者包括对盟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等,后者包括削减对盟国援助、对盟国实施经济制裁甚至武力威胁等。^④如果一国能够对盟国提供足够的收益补偿或施加难以承受的惩罚,盟国很可能会同该国保持一致。^⑤因此,联盟理论一般认为强国能促成联盟推行共同的对外政策。詹姆斯·莫罗提出,在不对称联盟中,强国和弱国存在“安全-自主”交易,弱国为获得强国的安全保证会放弃部分政策自主性;黄宇兴、普雷斯曼(Jeremy Pressman)等人的研究也指出,实力占优的一方可以凭借强大的谈判能力或实施可信的威胁促使盟国同自己保持一致。^⑥除了国家实力,议题

① 本文的联盟指的是军事联盟,成员拥有在冲突中获得盟国支持的预期。参见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p. 104-105.

②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 906.

③ 有关联盟管理的研究参见凌胜利:《联盟管理:概念、机制与议题——兼论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与中国的应对》,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16—25页;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3页。

④ Yasuhiro Izumikawa, “Binding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The Soviet-Japanese-US Diplomatic Tug of War in the Mid-1950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1, 2018, pp. 108-120.

⑤ 陈明霞、曾向红:《约束战略缘何失败——以俄乌关系的演变为例》,载《当代亚太》,2024年第1期,第105—131页;袁征、陈桂芸:《特朗普2.0版联盟战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嬗变》,载《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第3—22页。

⑥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pp. 904-933;黄宇兴:《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77—101页;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领域也会影响联盟协调的效果。联盟不仅协调军事安全议题,也会协调经贸科技、全球治理等领域议题。^① 相较而言,联盟成员通常在非军事安全类议题上的分歧更大。例如,冷战期间欧洲国家和日本时常违背美国的意愿,放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当前,部分盟国在是否加入中国倡导发起的国际组织、是否允许中国参与其本国 5G 建设等议题上对美国表现出选择性背离。^②

如表 1 所示,国际组织理论和联盟理论在解释盟国是否退出国际组织时,均强调退出国实力和组织类型(议题类型)的作用。相关理论在退出国实力与组织类型同向强化时具有较强解释力;当实力较强的退出国从军事安全类组织(如军事联盟)中退出时,盟国更有可能也退出。例如,当法国、美国等大国先后宣布不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履行财政和军事义务后,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退出了该联盟。^③ 当实力较弱的退出国从非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退出时,盟国退出的概率较低。例如,2025 年匈牙利国会批准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但其他北约盟国并没有退出。^④ 然而,在退出国实力与组织类型两个因素发生交互作用,即强国退出非军事安全类组织,或弱国退出军事安全类组织时,现有理论没有给出清晰预测。两类因素交互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再掀“毁约退群”潮,讨论强国退出非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后其盟国的政策选择具有现实意义。

①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6 期,第 26—55 页;左希迎:《美国联盟体系重组的战略形态》,载《战略决策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3—14 页;李冲、陈兆源:《美国构建供应链联盟的进展、类型与前景》,载《东北亚论坛》,2024 年第 6 期,第 32—43 页。

② 山本武彦:《围绕着中国委员会的同盟政治与日本》,载崔丕、青山瑠妙编:《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61 页;孙学峰、张希坤:《美国盟国华为 5G 政策的政治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6 期,第 110—137 页;任琳、郑海琦:《联盟异化的起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 2 期,第 33—58 页。

③ Leszek Buszynski, “SEATO: Why It Survived Until 1977 and Why It Was Abolished,”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2, 1981, pp. 287-296.

④ 新华网:《匈牙利国会批准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25 年 5 月 20 日, <https://www.news.cn/world/20250520/d33f8f6f1d044c61b7f995022705c3e8/c.html>, 访问时间: 2025 年 10 月 18 日。

表 1 现有理论对盟国是否退出国际组织的解释

	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	非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
退出国实力强	盟国退出概率高	未明确预测
退出国实力弱	未明确预测	盟国退出概率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盟国的效仿、追随与改革机制

既有国际组织理论较少关注退出国的行为对其盟国决策的影响,而联盟理论虽然强调成员之间的互动,但是未详细区分盟国在军事联盟和非军事联盟中考量的不同。由于盟国和退出国的承诺与协议主要在军事冲突领域,盟国在国际组织^①中的政策自主性一般较强。基于此,本文主张在研究盟国的决策时既要考虑退出国对盟国的冲击和影响,也要分析盟国对退出国冲击的应对,同时还应关注盟国行为的主动性和内驱性,并基于此提出效仿、追随与改革三种机制来解释盟国的政策选择。

(一) 盟国的效仿机制

模仿(mimic)/效仿(imitate)是指行为体遵循某种模式、典型或范例的过程。^② 模仿与效仿同属学习行为,但两者存在一定差异。前者是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一般缺乏清晰战略动机;后者往往具有明确的战略动机,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标而主动适应。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指出,模仿是社会化的初始阶段和表层机制,处在新环境中的行为体不清楚规范是什么,也不清楚是否应该遵守规范,但为了应对不确定性有充分理由去复制这些规范。^③ 本杰明·戈德史密斯(Benjamin Goldsmith)认为,当国家面临

① 下文所提到的“国际组织”均指除多边军事联盟以外的国际组织。

② 参见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mitate>, 访问时间:2025年4月9日。

③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6-73.

复杂决策环境时或者经历失败后,更有可能效仿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① 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化还是理性研究路径,都强调模仿/效仿的内驱性,即在非强制环境下出于内在意愿作出选择。^②

面对退出外交,盟国的效仿表现为主动,而非在退出国的强制压力下退出国际组织。关于盟国何种情况下选择效仿退出国,学界大致有“见贤思齐”和“物以类聚”两种观点。一些研究指出,国家会向强者看齐、向成功者学习。^③ 例如,作为首倡者的美国未加入国际联盟,很多拉美国家认为这表明美国不愿意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也对国联态度消极。^④ 另一些研究指出,国家会效仿与自身相似的国家。如果一国与他国在历史文化、地理位置、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等方面相似,就更可能与该国在利益排序、成本分析、行事风格等方面接近,进而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⑤ 例如,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损害美国主权”为由宣布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这之后,匈牙利、波兰等国也出于协定可能掣肘本国移民政策的考量而选择退出。^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① Benjamin Goldsmith, “Imi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alogies, Vicarious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3, 2003, pp. 237-267.

② 下文将不特别区分“模仿”与“效仿”,统一使用“效仿”表述。

③ 参见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302页; Benjamin Goldsmith, “Imi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alogies, Vicarious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pp. 237-267; Steve Wood and Lloyd Cox, “Status, Imitation, and Affective Disso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5, No. 4, 2021, pp. 634-656.

④ 李巨轸:《略论早期泛美体系的历史演变》,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9期,第58页。

⑤ 参见黄宇兴:《“小国集团”的政策协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119—120页; Laia Balcells, Chong Chen and Costantino Pischedda, “Do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Rebel Constituencies and Civil War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6, No. 1, 2022, pp. 1-15; Benjamin Goldsmith, “Imi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alogies, Vicarious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p. 239.

⑥ 新华网:《美国政府又退群了 这回是联合国移民问题谈判》,2017年12月5日,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05/c_129756372.htm,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新华网:《继美国后“退群”! 匈牙利退出联合国移民契约》,2018年7月20日,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7/20/c_129917050.htm,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假说 1-1: 当退出国实力优势较大时, 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更大。^①

假说 1-2: 当盟国与退出国意识形态接近时, 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更大。

(二) 盟国的追随机制

联盟政治中的追随(bandwagon)指一国在面对霸权国时主动与其结盟或合作,^②在退出外交背景下, 追随可以理解成盟国配合或服从退出国的政策。如江忆恩所说, 追随是对社会压力的回应。^③ 即使盟国并不想退出相关国际组织, 但由于双边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或安全承诺的牵引, 盟国会在退出国的诱压之下选择与其统一立场。

盟国在何种情况下, 以及何种程度上追随退出国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退出国是否要求盟国追随, 即退出国争取盟国一同退出的意愿。退出国并不必然要求盟国一同退出, 其退出国际组织的原因直接影响争取盟国一同退出的意愿。一些国家之所以退出国际组织, 可能是出于财政负担过重、经济利益受损、组织运行绩效不佳等原因。例如, 美国克林顿政府在 1995 年针对国际组织开展跨部门评估, 决定退出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原因是该组织为美国创造的价值较低。^④ 在此类情形下, 退出国际组织是退出国出于对自身的利益考量进行的政策调整, 而非地缘对抗的组成部分, 一般不要求盟国采取相同行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 国家退出国际组织可能是出于主权争端、意识形态冲突、地缘对抗等政治类原因。此时退出行为一般不是孤立事件, 而是退出国地缘战略或外交对抗

① 应考虑联盟中有多个大国时盟国的选择。本文认为, 在拥有多个大国和多个小国的不对称联盟中, 大国一般会划分彼此负责的区域。在各大国所负责区域内, 效仿以及后文提出的追随与改革机制依然是成立的。参见黄宇兴:《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 年第 6 期, 第 80—81 页。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③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

④ 现称联合国旅游组织(UN Tourism)。美国对盟国旅游组织的评估参见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U. S. Participation in Special-Purpo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ttps://www.gao.gov/assets/ansiad-97-35.pdf>, 访问时间: 2025 年 10 月 18 日。

的一部分。退出国希望盟国加以配合,为其退出的正当性背书。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不久,苏联就以抗议该组织未能向东欧国家提供足够资源为由宣布退出,随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9个东欧国家陆续宣布退出该组织。^① 2011年巴勒斯坦以正式会员身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美国与以色列便停止缴纳会费,2017年美以两国先后宣布退出。^② 二是退出国能否处理盟国的异见,即退出国管控盟国的能力。当退出国管控盟国的能力足够强大,能够对盟国施加足够压力或提供足够补偿时,盟国更可能追随退出国一道退出国际组织。一国对联盟的管控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通常与实力差距成正比,实力差距也许是衡量管控能力最直观的指标。如果退出国拥有较大的实力优势,其约束或者管控盟国的资源和手段往往会更丰富,同时盟国对退出国安全依赖程度也会更高,追随退出国的概率更大。反之,如果退出国相对盟国没有明显实力优势,甚至处在劣势地位,盟国追随退出国的概率较小。例如,印度尼西亚因马来西亚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于1965年退出联合国,并提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但几乎未得到回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1: 当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国际组织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较大。

假说 2-2: 当拥有较大实力优势的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国际组织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更大。

(三) 盟国的改革机制

二战后的国际实践表明,虽然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时有发生,但整体上看国家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较低,大多数国际组织能够存续。因此,探讨退出国对盟国的影响不仅要思考“盟国为何退出”,还应该关注“盟国为何不退

^① Niels Blokker, “Withdrawing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Niels M. Blokker, Daniëlla Dam-de Jong and Vid Prislán eds., *Furthering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ill | Nijhoff, 2021, pp. 1-20.

^② 新华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以色列退出深表遗憾》,来源: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30/c_1122189372.htm,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出”。通常而言,退出会产生时间、声誉、国内压力等成本,而继续留在组织内一般也不用额外付出,因此盟国在退出国没有显著施压的情况下“维持现状”——既不积极履职也不宣布退出可能是理性选择。但是应该指出,退出国对国际组织和组织其他成员造成的影响有时并不能忽略,尤其是大国的退出,即使没有直接造成组织解体,也可能在合法性、治理绩效、预算分配等方面对国际组织造成冲击。此时如果想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盟国不仅不能只维持现状,还需要启动国际组织改革,加大对组织的投入,弥补退出国造成的治理与财政赤字,帮助国际组织度过危机。

基于改革机制的视角,当退出国退出国际组织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将减小。不过改革并非自动启动,盟国是否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改革的可能性,即盟国是否有意愿进行谈判与调整,是否能承担改革带来的成本。如果国际组织主要涉及非政治安全类议题,例如贸易、卫生、环境、技术合作等,围绕相关议题进行的谈判与制度设计往往更技术化,不涉及主权安全、价值观等分歧,成员协商与妥协空间较大,改革成本相对较低。其他成员如能增加资金投入,或作出一定程度让利,组织即能继续运转。例如,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日本与相关国家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①但如果国际组织涉及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议题,成员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大,改革空间会缩小。^②二是改革的必要性,即退出国是否对国际组织构成重大威胁。大国在国际组织中通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大国的退出可能大幅度削弱国际组织功能,甚至导致组织出现合法性危机。成员如仍想留在组织中,需要主动推动改革。例如,英国“脱欧”后欧盟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与之相对,小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有限,其退出不一定削弱组织核心功能,对组织合法性影响不明显,其他成员可能不会投入资源进行改革。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① 新华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2018年12月30日,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2/30/c_1123929362.htm,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②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When Do Withdrawal Threats Achieve Refor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Perspectives*, Vol. 4, No. 1, 2023, pp. 1-18.

假说 3-1: 当退出国退出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较小。

假说 3-2: 当拥有较大实力优势的退出国退出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更小。

四、研究设计与假说检验

本文以 1945—2014 年间国家退出国际组织数据和国家间军事联盟数据为基础,使用双重(三重)差分法与混合效应回归模型检验相关假说。之所以选取 1945 年以后数据,一方面是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当前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国际组织大多是二战后建立的。

(一) 数据与模型

本文在博尔济斯科夫斯基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了国家退出国际组织的数据。^① 相关数据包含 1945—2014 年间政府间国际组织^②中的成员退出记录,基本分析单元为“国际组织—成员—年份”。联盟数据来自联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库(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 Provisions, ATOP),基本分析单元为“国家—盟国—年份”。^③ 此外,本文以国际组织数据为基础,为每一个潜在退出国匹配盟国信息。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来评估退出国对盟国的影响。双重差分法是用来

①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p. 335-366.

② 博尔济斯科夫斯基等人按照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 COW)的定义来界定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至少由 COW 国家体系中的三个成员组成;(2)至少每十年举行一次定期全体会议;(3)拥有常设秘书处和相应总部机构。

③ ATOP 将联盟的安全承诺分为进攻、防御、中立、互不侵犯、协商五类,本文主要关注包含进攻性和防御性安全承诺的联盟,即当一国对外发动攻击时盟国应提供武力支持,或者当一国遭受外部攻击时盟国提供武力支持。有关 ATOP 数据库及联盟类型介绍参见 Brett Leeds, Jeffrey Ritter, Sara Mitchell & Andrew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2002, pp. 239-240.

估计政策或事件干预效果的常用方法,一般以事件是否发生将研究对象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① 处理组中的样本在某个或某些时间点上受到特定事件影响,对照组的样本则未受事件影响。本文将包含退出行为的数据作为处理组,将成员未退出的数据作为对照组。^② 为估计退出国对盟国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将每一条数据记录向前追溯5年、向后扩展4年,扩展成10条数据。如图1所示,处理组中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平均效应分别记为A和C,对照组中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平均效应分别记为B和D。理论上讲,即使没有接受政策干预,处理组的平均效应也会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A_1)。因此,退出国对盟国影响的“净效果”应该为 $C - A - (A_1 - A)$ 。在现实中无法直接观测到 A_1 ,但根据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parallel trend)假设,干预事件发生前对照组和处理组样本的平均效应一致,因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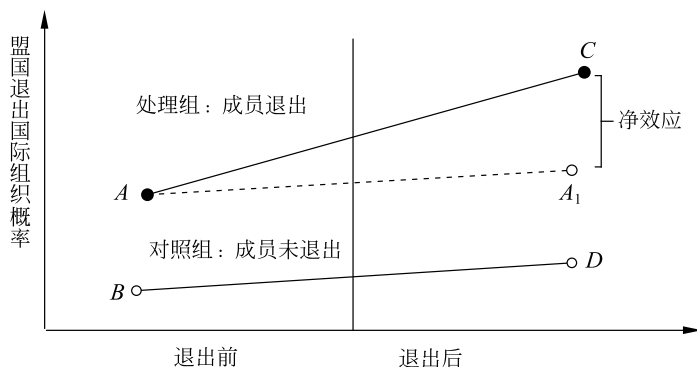


图1 退出国对盟国退出国际组织概率的影响示意图^③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邱嘉平:《因果推断实用计量方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有的研究将对照组称作“控制组”,参见 Brantly Callaway and Pedro H. C. Sant'Ann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225, No. 2, 2021, pp. 200-230.

② 国家退出国际组织仍是稀有事件,导致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数据量过于悬殊,因此本文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P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依据国际组织民主化程度、议题类型、规模大小、是否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是否包含退出条款、成员资格持续时间等变量计算每条数据记录的倾向得分,并从处理组中筛选出与对照组中倾向得分接近的数据进行检验。

③ 图1是示意图,并不代表退出国退出国际组织后,其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一定提高。

以用 $D-B$ 来代替 A_1-A 。此外,考虑到相关数据具有层级结构(国际组织—国家)和嵌套关系(退出国与盟国均为国际组织成员),本文还使用混合效应模型(Mixed Effects Model),在控制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因素的基础上,针对退出国退出之后盟国的表现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探索。

(二) 变量与操作化

双重差分法基本模型如式(1)所示。因变量 $Withdrawal_{ijt}$ 表示(潜在)退出国 i 的盟国 j 在时间 t (年份)是否宣布退出国际组织,是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自变量“退出”是由 $Withdrawal_i$ 和 $Post_t$ 组成的交互项,表示(潜在)退出国 i 在时间 t 是否宣布退出国际组织。其中 $Withdrawal_i$ 是处置虚拟变量,当(潜在)退出国 i 退出国际组织时赋值为1,未退出国际组织时赋值为0^①; $Post_t$ 是时间虚拟变量,取值为1表示该年份在退出国宣布退出之后,取值为0表示该年份在退出国宣布退出之前。^②系数 β 反映了退出国对盟国影响的“净效应”。 X_{it} 是控制变量,包括退出国与盟国实力对比、政体类型、大国身份、地理毗邻程度等。^③ α_0 是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 ϵ_{it} 是随机

① 鉴于国家完全退出国际组织需要遵循一系列流程,因此本文以宣布退出来刻画变量。

② 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个体固定效应项与年份固定效应项已经完全捕捉到 $Withdrawal_i$ 和 $Post_t$ 的效应,因此模型中不包含单独的 $Withdrawal_i$ 与 $Post_t$ 。类似处理方法参见 Yi Lu, Jin Wang and Lianming Zhu, “Place-Based Policies, Cre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Vol. 11, No. 3, 2019, pp. 325-360; 黄贝、王霄、刘哲希:《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冲突——基于水电站项目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1期,第38—66页。

③ 政体类型指退出国与盟国是否同属西方式民主国家,数据来自“政体数据”(Polity V), Monty G. Marshall and Keith Jaggers, “Polity 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8,” 参见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大国身份指退出国与盟国是否为大国(major power),数据来源于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OW Project) 国家体系资格(State System Membership)数据集,参见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state-system-membership/>, 访问时间:2025年3月27日。毗邻性指退出国与盟国之间的地理接近程度,根据 COW Project 的“直接毗邻性(Direct Contiguity)”数据集确定,参见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direct-contiguity/>,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上述变量同时可以通过 R 软件包 peacesciencer 获得,参见 <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peacesciencer/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误差项。

本文不仅在整体上检验退出国对盟国退出国际组织概率的影响,还关注不同场景和条件下退出国对盟国影响的差异,因此在式(1)的基础上增加了变量 *Group* 构成三重差分法(式(2))。通过比较 β_1 和 β_3 ,可以得出不同组别中个体处置效应的差异。^①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说,界定不同 *Group* 的变量包括:

(1) 实力对比,反映退出国与盟国的实力差距。数据来自国家能力综合指标(CINC),计算方法为退出国实力/(退出国实力+盟国实力)。^②

(2) 意识形态差距,反映退出国与盟国在特定问题上的立场看法是否一致。数据来源于“民主多样性”数据库(V-dem)。计算时取二者意识形态差值的绝对值,取值越大表示两国意识形态差距越大。^③

(3) 退出原因,当退出国因发生战争、国内政局重大变动、对组织成员身份有异议、认为主权遭侵蚀、对组织产生政治不满等政治类原因退出时,赋值为1;因成本分担、对组织绩效不满、预先规避惩罚、认为组织过时或职能重叠等原因退出时,赋值为0。^④

(4) 议题领域,如果国际组织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text{Withdrawal}_{ijt} = \beta \text{Withdrawal}_i \times \text{Post}_t + \text{ZX}_{it} + \alpha_0 + \epsilon_{it} \quad (1)$$

$$\text{Withdrawal}_{ijt} = \beta_1 \text{Withdrawal}_i \times \text{Post}_t + \beta_2 \text{Group} + \beta_3 \text{Withdrawal}_i \times \text{Post}_t \times \text{Group} + \text{ZX}_{it} + \alpha_0 + \epsilon_{it} \quad (2)$$

混合效应模型用于检验退出国退出国际组织之后对盟国的影响。如式(3)所示。因变量 $\text{Withdrawal}_{ijt+5}$ 表示退出国 *i* 退出国际组织后的五年内盟国 *j* 是否退出国际组织。 Control_{ijt} 是控制变量,除前面提到的变量外,还

① 用三重差分法研究不同个体处置效应的差异性的研究可参考钱雪松、唐英伦、方胜:《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载《金融研究》,2019年第7期,第115—131页。

② COW Project,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7.0),” 参见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③ 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 “V-Dem Dataset v15,” 参见 <https://www.v-dem.net/data/the-v-dem-dataset/>,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④ 当国家退出国际组织既包括政治类原因也包括非政治类原因时,变量取值为1。

包括国际组织层面控制变量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嵌套控制变量。国际组织层面变量有:(1)组织规模,即国际组织的成员数量的对数值。(2)组织绩效,变量取值范围是0~1。(3)联合国机构,反映该国际组织是否为联合国机构。(4)退出条款,表示国际组织中是否包含退出条款。国家和国际组织嵌套的控制变量有:(1)加入时间,截至观察年份盟国加入特定国际组织的时间(年)的对数。(2)退出时间,即国际组织上一次有成员退出距观察年份的时间,计算时取对数。考虑到时间依赖性,模型中还加入退出时间的平方项与立方项。 v_i 与 v_j 分别代表国家层面和国际组织层面的随机效应, ϵ_{it} 是随机误差项。

$$\text{Withdrawal}_{ijt+s} = \theta_1 \text{Group} + Z\text{Control}_{ijt} + v_i + v_j + \epsilon_{it} \quad (3)$$

(三) 结果分析

表1使用双重差分法从整体上估计退出国对盟国的影响。^①模型1是主检验,核心自变量“退出”的系数为正且在99.9%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退出国退出国际组织之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将显著上升。在控制变量层面,“盟国大国身份”和“毗邻程度”系数均为负,说明大国在联盟中自主性较强、地理距离制约退出国对盟国的影响力,均符合既有理论预期。模型2~4是对模型1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模型2在对照组中随机抽取与处理组数据样本量相同的数据。模型3和模型4分别在倾向值得分和随机匹配数据中使用logit模型。^②在模型2中,自变量“退出”的系数为正且在99.9%置信水平上显著。模型3和模型4中“退出”的系数也为正。同时,本文也对相关数据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如图2所示,在退出国退出国际组织之前,对照组和处理组数据中盟国退出国际组织概率的差距在95%的置信区间上并不显著异于0,可以认为两组数据没有显著差异;而在退出国退出国际组织之

① 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为R 4.4.3 version。

② 当因变量为只包含0和1两类取值的虚拟变量时,既可以使用logit等非线性概率模型,也可以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ogit模型一般仅在传统两期差分中使用。本文数据涉及多期差分,因此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作为主模型。参见Pinar Karaca-Mandic, Edward C. Norton and Bryan Dowd, “Interaction Terms in Nonlinear Models,”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Vol. 47, No. 1, 2012, pp. 255-274。

表 1 退出国对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影响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退出	0.011**** (0.003)	0.016**** (0.002)	0.681 (1.030)	1.040 (2.578)
实力对比	-0.037 (0.025)	-0.096*** (0.036)	61.089** (27.953)	-115.830* (64.921)
退出国政体类型	-0.001 (0.004)	-0.002 (0.004)	-0.605 (1.964)	-4.975 (4.340)
盟国政体类型	-0.003 (0.002)	0.000 (0.002)	-0.998 (3.367)	18.460**** (5.437)
退出国大国身份	6.907 (165.316)	-1.225 (475.919)	—	—
盟国大国身份	-0.010*** (0.003)	-0.010*** (0.004)	—	—
毗邻程度	-0.002 (0.001)	-0.003**** (0.000)	—	—
样本量	23842	24797	504	436
个体固定效应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系数估计值下方的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p<0.1$, **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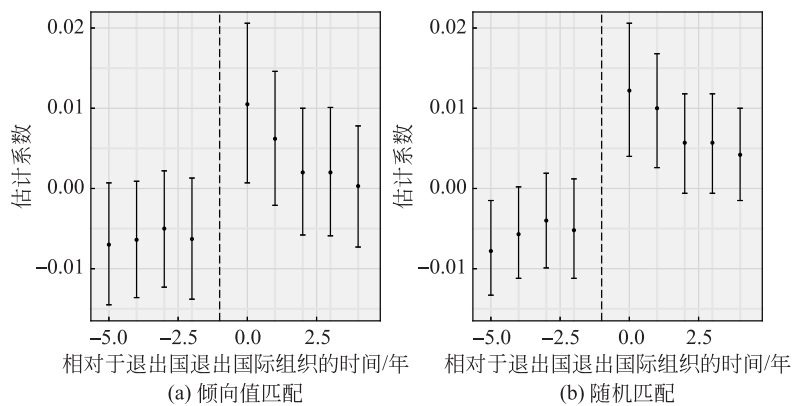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后,整体上处理组中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要高于对照组,尤其是在退出后的前两年,两组数据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异于 0。表 2 中模型 1 是针对假说 1-1 的检验。其中“退出”的系数显著为正,“退出×实力对比”系数为负,与假设 1-1 预测不符。模型 2~5 是针对假说 1-2 的检验。通常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家会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而价值观保守、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更可能“毁约退群”,因此本文依据 V-dem 数据库在社会层面选择“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变量,在执政党层面选择“反多元”和“民粹主义”两个变量来衡量退出国和盟国意识形态一致程度。在模型 2~5 中,“退出”系数显著为正,相应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这表示意识形态的不一致会制约盟国对退出国的效仿。随着意识形态不一致程度升高,盟国效仿退出国的概率逐渐下降。当意识形态不一致程度达到较高水平时,退出国对盟国退出的影响接近 0,甚至还提高了盟国留在国际组织中的概率(图 3)。模型 6 采用混合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除“民粹主义”外,“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反多元”等变量系数也均为负,进一步佐证了假说 1-2 的观点。

表 2 效仿机制检验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退出	0.017**** (0.005)	0.020**** (0.004)	0.018**** (0.004)	0.012*** (0.004)	0.009** (0.004)	— —
实力对比	-0.035 (0.025)	— —	— —	— —	— —	-0.108 (0.075)
退出×实力对比	-0.009 (0.006)	— —	— —	— —	— —	
民族主义	— —	0.010* (0.005)	— —	— —	— —	-0.100* (0.052)
退出×民族主义	— —	-0.026**** (0.007)	— —	— —	— —	— —
保守主义	— —	— —	0.009** (0.005)	— —	— —	-0.043 (0.066)
退出×保守主义	— —	— —	-0.024** (0.010)	— —	— —	— —

续表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退出时间 ²	—	—	—	—	—	0.002** (0.001)
退出时间 ³	—	—	—	—	—	-0.000** (0.000)
常数项	—	—	—	—	—	-1.694*** (0.620)
样本量	23842	23733	23733	17103	17103	301
个体固定效应	✓	✓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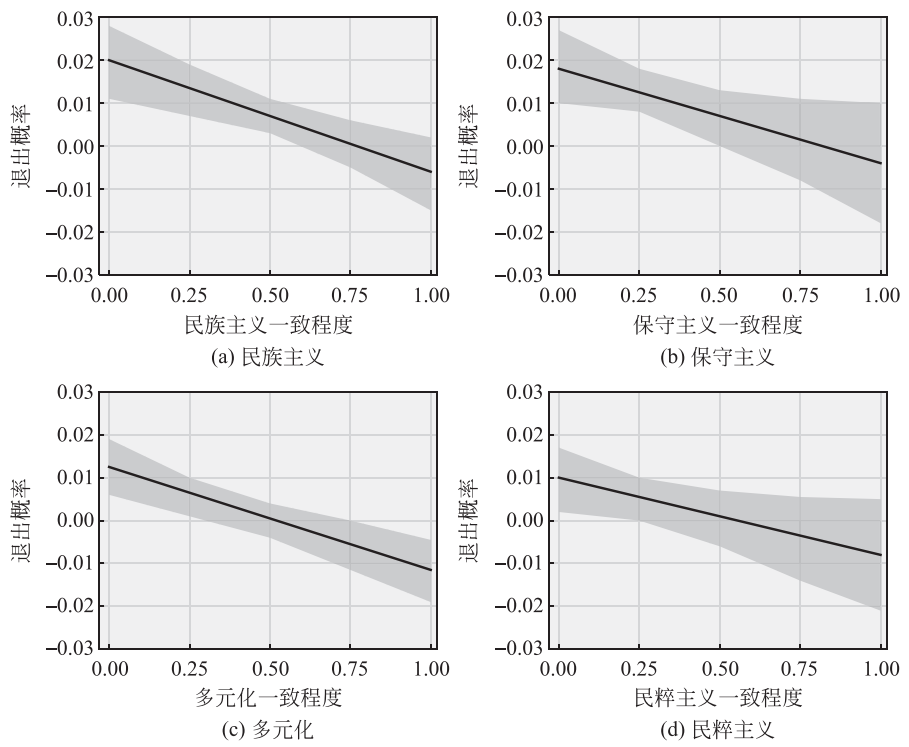


图 3 效仿机制边际效应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3 是对效仿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模型 1~5 在随机匹配数据中使用三重差分法。“退出”“退出×实力对比”“退出×民族主义”等主要解释变量系数符号与表 2 一致。模型 6 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因变量为盟国是否在退出国宣布退出的当年退出国际组织,其中“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反多元”系数均为负,与表 2 结果一致。

表 3 效仿机制稳健性检验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退出	0.023 ^{****} (0.004)	0.027 ^{****} (0.004)	0.023 ^{****} (0.004)	0.017 ^{****} (0.004)	0.012 ^{****} (0.003)	— —
实力对比	-0.094 ^{**} (0.036)	— —	— —	— —	— —	-0.024 (0.048)
退出×实力对比	-0.011 [*] (0.006)	— —	— —	— —	— —	— —
民族主义	— —	0.016 ^{****} (0.004)	— —	— —	— —	-0.082 ^{**} (0.033)
退出×民族主义	— —	-0.032 ^{****} (0.007)	— —	— —	— —	
保守主义	— —	— —	0.005 (0.004)	— —	— —	0.023 (0.042)
退出×保守主义	— —	— —	-0.026 ^{***} (0.010)	— —	— —	— —
反多元	— —	— —	— —	0.005 ^{**} (0.002)	— —	-0.061 (0.039)
退出×反多元	— —	— —	— —	-0.027 ^{****} (0.006)	— —	— —
民粹主义	— —	— —	— —	— —	-0.003 (0.003)	0.107 ^{**} (0.049)
退出×民粹主义	— —	— —	— —	— —	-0.012 (0.008)	— —
退出国大国身份	-1.241 (485.313)	-2.616 (1056.858)	-2.819 (1022.217)	0.038 (717.381)	0.051 (717.651)	0.019 (0.029)

续表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盟国大国 身份	-0.010*** (0.003)	-0.009*** (0.003)	-0.011*** (0.004)	-0.011*** (0.003)	-0.009*** (0.003)	0.124*** (0.033)
退出国政体 类型	-0.003 (0.004)	-0.002 (0.004)	-0.002 (0.004)	-0.001 (0.004)	-0.001 (0.004)	0.046 (0.069)
盟国政体 类型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22 (0.028)
毗邻程度	-0.004***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0.061 (2959.470)	-0.055 (2961.018)	-0.009 (0.007)
加入时间	— —	— —	— —	— —	— —	0.020 (0.051)
组织大小	— —	— —	— —	— —	— —	0.059 (0.094)
组织绩效	— —	— —	— —	— —	— —	0.243 (0.160)
联合国 机构	— —	— —	— —	— —	— —	-0.067 (0.178)
退出条款	— —	— —	— —	— —	— —	-0.066 (0.054)
退出时间	— —	— —	— —	— —	— —	-0.007 (0.013)
退出时间 ²	— —	— —	— —	— —	— —	0.000 (0.001)
退出时间 ³	— —	— —	— —	— —	— —	-0.000 (0.000)
常数项	— —	— —	— —	— —	— —	-0.186 (0.399)
样本量	24797	24694	24694	19674	19674	301
个体固定效应	✓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4 是对追随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 1 与模型 2 对假说 2-1 进行检验,分别针对倾向值与随机匹配数据使用三重差分法。“退出”系数为正,“退出×退出原因”系数为负,表示与非政治类原因退出相比,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可能下降。这与假说 2-1 不符。模型 3 与模型 4 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对假说 2-2 进行检验,因变量分别是盟国在五年内和当年是否退出国际组织。两个模型中“退出原因”系数在 90%和 99.9%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为负,“退出原因×实力对比”系数在 99%置信区间上显著为正。根据模型 3 与模型 4 的结果,本文绘制了退出国的退出原因对盟国影响的边际效应图。如图 4 所示,当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后,盟国退出国际组织概率的边际效应随着退出国实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当退出国具有显著实力优势时,政治类原因的边际效应甚至由负转正,同假说 2-2 判断一致。这表明,当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时,即使有较强的意愿争取盟国支持也未必能如愿,只有当退出国同时拥有较大实力优势才能促使盟国追随。

表 4 追随机制及稳健性检验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退出	0.014 (0.009)	0.024*** (0.008)	— —	— —
退出原因	−0.003**** (0.001)	−0.001 (0.005)	−0.186* (0.101)	−0.340**** (0.078)
退出×退出原因	−0.0004 (0.005)	−0.005 (0.005)	— —	— —
实力对比	−0.017 (0.023)	−0.082** (0.037)	−0.205** (0.083)	−0.095 (0.062)
退出原因×实力对比	— —	— —	0.320*** (0.105)	0.232*** (0.078)
退出国大国身份	1.017 (209.310)	4.366 (1399.036)	−0.029 (0.126)	−0.185 (0.147)
盟国大国身份	−0.009** (0.004)	−0.011*** (0.004)	0.083* (0.044)	0.036 (0.033)

续表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退出国政体类型	0.0004 (0.004)	0.002 (0.004)	-0.021 (0.096)	-0.007 (0.076)
盟国政体类型	-0.0001 (0.002)	0.001 (0.002)	-0.035 (0.032)	-0.015 (0.024)
毗邻程度	-0.002*** (0.001)	-0.002**** (0.001)	0.005 (0.010)	-0.008 (0.007)
加入时间	— —	— —	0.174** (0.074)	0.058 (0.056)
组织大小	— —	— —	-0.368**** (0.105)	-0.622**** (0.088)
组织绩效	— —	— —	-0.123 (0.372)	-0.030 (0.423)
联合国机构	— —	— —	0.433** (0.192)	0.551*** (0.209)
退出条款	— —	— —	-0.259 (0.214)	-0.416* (0.244)
退出时间	— —	— —	-0.030 (0.021)	0.041*** (0.016)
退出时间 ²	— —	— —	0.000 (0.001)	-0.002*** (0.001)
退出时间 ³	— —	— —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 —	— —	1.703**** (0.457)	2.588**** (0.420)
样本量	20816	21771	422	422
个体固定效应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5 是关于改革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 1 与模型 2 是使用三重差分法对假说 3-1 进行检验。“退出”系数显著为正,“退出×议题领域”系数为正且小于“退出”的系数值,这表示“退出”的效用被“议题领域”削弱了。与包含政治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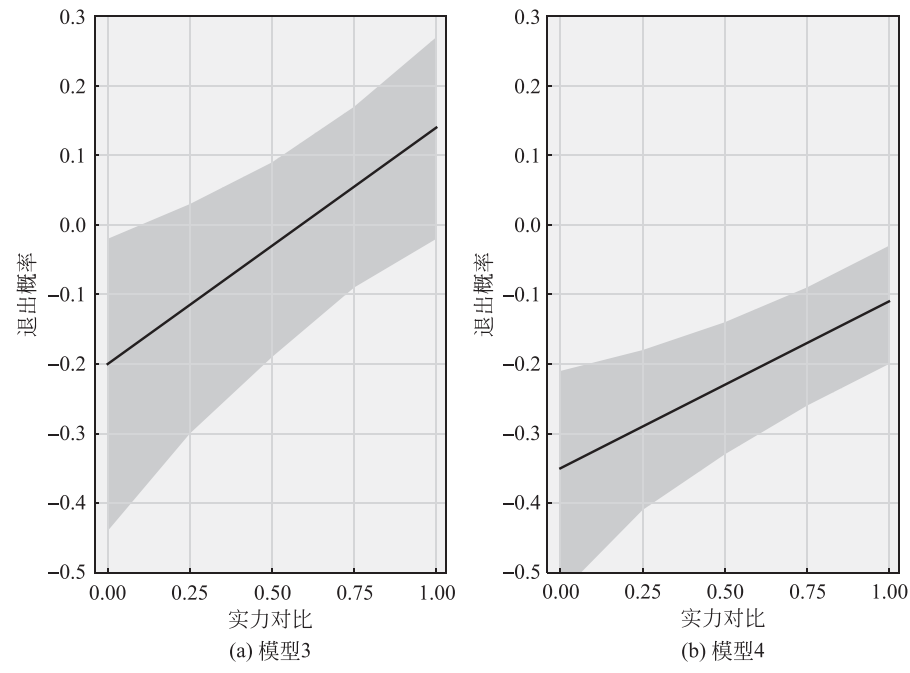


图 4 追随机制边际效应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5 改革机制及稳健性检验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退出	0.010*** (0.004)	0.016**** (0.003)		
议题领域	-6.864 (742.896)	-0.683 (268.203)	0.389 (0.302)	-0.050 (0.328)
退出×议题领域	0.002 (0.004)	0.001 (0.005)		
实力对比	-0.037 (0.025)	-0.096*** (0.036)	0.191* (0.098)	0.172** (0.077)
议题领域×实力对比			-0.312*** (0.111)	-0.222** (0.088)
退出国大国身份	3.719 (431.702)		-0.040 (0.135)	-0.208 (0.148)

续表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盟国大国身份	-0.010*** (0.003)	-0.010*** (0.004)	0.097** (0.044)	0.048 (0.034)
退出国政体类型	-0.001 (0.004)	-0.002 (0.004)	-0.055 (0.094)	0.053 (0.077)
盟国政体类型	-0.003 (0.002)	0.000 (0.002)	-0.049 (0.031)	-0.020 (0.024)
毗邻程度	-0.001 (0.001)	-0.002**** (0.001)	0.003 (0.009)	-0.008 (0.007)
加入时间			0.128* (0.071)	0.049 (0.057)
组织大小			-0.362**** (0.105)	-0.579**** (0.089)
组织绩效			-0.206 (0.400)	0.120 (0.434)
联合国机构			0.411** (0.200)	0.452** (0.209)
退出条款			-0.381 (0.301)	-0.330 (0.330)
退出时间			-0.008 (0.019)	0.040*** (0.015)
退出时间 ²			-0.000 (0.001)	-0.002*** (0.001)
退出时间 ³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1.446*** (0.455)	2.161**** (0.416)
样本量	23842	24797	433	433
个体固定效应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相比,退出国退出不涉及政治安全类议题国际组织后,盟国退出该组织的概率较低。模型3与模型4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对假说3-2进行检验,其中“议题领域 $\times$ 实力对比”的系数显著为负。如图5所示,随着退出国实力优势逐渐上升,盟国退出不涉及政治安全类议题国际组织的概率逐渐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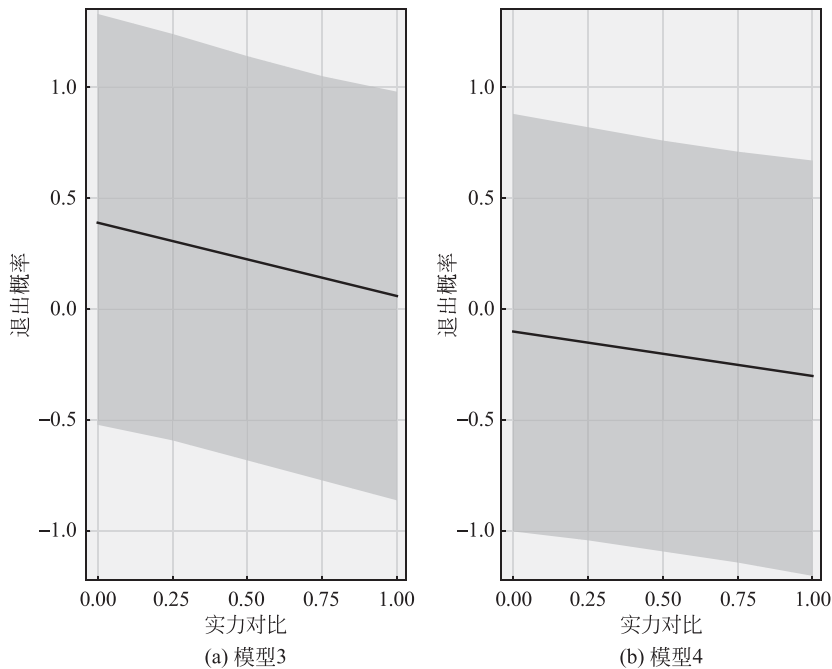


图5 改革机制边际效应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案例分析:以苏联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为例

这一部分将通过考察1949年苏联,以及2020年、2025年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案例来展示前文提出的三种机制。选择相关案例有以下考量:一是世卫组织是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退出国苏联和美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讨论大国退出非政治安全领域国际组织,既有助于完善现有理论也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在苏联和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盟国的政策选择

存在明显差异。1949年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前夕,苏联致电世卫组织总干事,称“不再认为自己是世卫组织的成员国”,之后一年内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苏联的东欧盟国也陆续宣布退出世卫组织。^①2020年7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将退出世卫组织,但其主要盟国并没有退出。部分欧洲盟国反而加大了对世卫组织的投入。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再次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同年2月,阿根廷等国也启动退出世卫组织的进程。第三,相关案例能够展示不同机制影响下盟国的政策选择。冷战期间的苏联更倾向于使用强制手段进行联盟管理,当前美国盟国的战略自主空间相对较大。

(一) 苏联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国家已开始就世界卫生和健康事务开展合作。1943年,44国签署《联合国善后救济公约》,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其宗旨是“计划、协调、管理或安排管理措施,通过提供食物、燃料、衣服、住所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医疗和其他基本服务,救济在任何联合国控制下的地区的战争受害者”。^②在1945年举行的旧金山会议上,中国与巴西代表联合提议成立全球性卫生组织。^③1946年,联合国召开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也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成立临时委员会。1948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生效,世卫组织正式成立。^④苏联参加了1948年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并成为世卫组织的创始成员,但此后不到一年其政策发生了转变。1949年2月,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⑤向世卫组织致电称

① John Farley, *Brock Chishol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8, p. 80.

② 1942年1月,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签署该宣言的国家被称作“联合国”。有关UNRRA的介绍参见 <https://archives.un.org/zh/content/wwii-refugees>,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③ Marcos Cueto, Theodore M. Brown and Elizabeth Fe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8.

④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历史》,参见 <https://www.who.int/zh/about/history>,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⑤ 乌克兰、白俄罗斯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联合国、世卫组织等机构拥有正式席位和投票权。

“(世卫组织)未能令人满意地完成与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国际措施,以及传播医学科学成果相关的任务”,“维持该组织臃肿的行政机构所需的开支过于沉重”,因此决定退出世卫组织。^①

苏联退出世卫组织并非单纯出于技术或经费考虑,而是在阵营对抗和意识形态对立背景下对国际制度不信任的体现。世卫组织成立后,苏联与美国在组织应重点执行社会医学还是技术生物医学政策上存在不同看法。^②苏联支持社会医学观点,认为疾病流行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控制疾病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苏联代表在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表示,“世卫组织不要试图通过可怜的缓和措施来控制流行病,而要关注社会改革和国家卫生服务发展问题”。^③美国等西方国家则主张流行病属于生物医学事件,世卫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向医疗卫生状况较差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由于美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美洲国家在投票中也集体支持美国,世卫组织在政策上逐渐侧重美国的主张,预算编制、人员任命、项目审批等也受到美国的影响。^④同时,美国也计划将世卫组织作为遏制苏联的平台与工具。美国助理国务卿威拉德·L.索普(Willard L. Thorp)在演讲中将公共卫生与遏制共产主义相联系,称美国应该与疾病和贫困作斗争,因为“二者滋生共产主义、威胁民主生存”。^⑤美国国会众议员弗朗西斯·博尔顿(Frances P. Bolton)解释美国为什么要支持世卫组织时称“疾病滋生贫困,贫困又滋生疾病,国际共产主义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发展”。^⑥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Third Session Held in Geneva from 21 February to 9 March 1949*, Geneva: WHO, 1949, p. 52.

② Marcos Cueto, Theodore M. Brown and Elizabeth Fe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 History*, p. 2.

③ John Farley, Brock Chishol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p. 62.

④ John Farley, Brock Chishol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p. 82; 夏云、张勇安:《国际组织与全球卫生史书写的新范式——评马科斯·奎托等著〈世界卫生组织史〉》,载《全球史评论》,2023年第1期,第284页。

⑤ “Defense and World Health,” *Public Health Reports (1896—1970)*, Vol. 65, No. 49, 1950, p. 1611.

⑥ Elizabeth Fee, Marcu Cueto and Theodore M. Brown, “At the Root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Challenges: Politics and Region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106, No. 11, 2016, p. 1913.

一方面,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对美国通过国际组织扩展影响力高度警惕,将世卫组织等视作美国的霸权工具。^① 另一方面,在苏联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之际,苏联也显著加强了对东欧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二战结束后,鉴于东欧国家国内存在多种政治力量,苏联支持东欧各国实行“联合政府”政策,即各国共产党联合其他党派共同组建政府。然而,在运行过程中,东欧国家政府中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代表时常出现分歧。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苏联曾要求东欧国家集体不参与“马歇尔计划”,然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称波兰工人党和捷克共产党的观点不代表本国政府观点,对加入马歇尔计划持积极态度。^② 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旨在协调苏联和欧洲国家政策。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日丹诺夫作国际形势报告时强调“阵营对抗”。^③ 随后,东欧各国政府中其他政治力量逐步退出。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后,东欧国家均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④

从时间上看,苏联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一年内,保加利亚(1949年11月)、罗马尼亚(1950年2月)、阿尔巴尼亚(1950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1950年4月)、匈牙利(1950年5月)、波兰(1950年8月)均宣布退出。从立场上看,东欧各国退出世卫组织时的表态与苏联十分接近。^⑤ 其中波兰代表的发言最为典型——“(苏联的观点)代表人类的利益,要求医学科学的成就应该服务于全人类……而资本主义阵营则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将科学视为收入来

① 罗艳华、朱思思:《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大国合作:动因与共同利益建构——基于对美苏和中美合作的案例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25年第2期,第57页。

② 参见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载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3页。

③ 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载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1—84页。

④ 参见吴伟:《捷克斯洛伐克:从科息策纲领到二月事件》,载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页。

⑤ World Health Assembly,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Bulgaria, Rumania, Albania and Czechoslovakia*, 1950,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99839>, 访问时间:2025年4月28日; World Health Assembly, *Communication from the Minister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Hungary*, 1950,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100106>,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源和战争武器。世卫组织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向美国投降了”。^① 美国国务院分析认为,“苏联退出世卫组织后正在鼓励其东欧盟国退出联合国专门机构。随着波兰在联合国机构代表团中的技术人员逐渐被共产党员取代,其利用国际组织同西方保持经济联系的倾向正在减弱,波兰在1950年接连退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卫组织等一系列机构,就是苏联限制东欧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接触的政策例子”。^②

苏联退出世卫组织后盟国的行为体现了追随的逻辑。一方面,苏联的退出是出于对美国所代表的卫生治理理念的反对,以及对美国试图利用世卫组织在东欧推行其相关政策的不满,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在以美苏阵营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大背景下,苏联希望且也需要在退出后得到东欧盟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二战后经过数年的政策调整,苏联已经能够对东欧盟国的政策发挥重要影响。因此,在苏联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出现了东欧盟国接连退出的局面。

(二) 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于1948年批准《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但以国会联合决议(joint resolution)的方式保留提前一年通知后可以退出的权利。^③ 正是依据此项规定,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7月以应对新冠疫情不力、会费分摊不平

① World Health Assembly, *Second World Health Assembly, Decisions and Resolutions: Plenary Meetings Verbatim Records: Committees Minutes and Reports: Annexes*, 1949, pp. 105-106,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85600>,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Statement,” November 27, 1950, in William Z. Slany, Charles S. Sampson and Rogers P. Churchill,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Volume IV*,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 p. 1044.

③ Luisa Blanchfield and Matthew C. We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Background and U. S. Withdrawal,”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N12496>,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等、部分成员国施加不当影响为由宣布退出世卫组织。^① 由于拜登(Joseph R. Biden)在2021年出任总统后撤回特朗普的决定,美国的退出并未生效。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再次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退出世卫组织。^② 在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其盟国的表现存在差异。绝大部分盟国并未启动“退群”,部分盟国(如德国、法国)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后加大对世卫组织的资金投入并推动组织改革。与此同时,个别盟国(如阿根廷、匈牙利、意大利)也在讨论退出世卫组织。

意识形态差异是解释盟国政策选择差异的重要因素。图6和图7反映了美国与部分盟国的意识形态变化。近年来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兴盛,执政党反多元和民粹主义倾向明显。在盟国中,阿根廷、意大利、匈牙利等与美国较为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右翼势力逐步抬头,其中以匈牙利和意大利为代表的东南欧、南欧国家更是见证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③ 匈牙利在2010年后长期由欧尔班(Orbán Viktor)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青民盟”)执政。欧尔班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两人在加强国家主权、捍卫传统宗教与家庭价值观、反对移民、反对自由主义多元化等方面持相同立场。^④ 意大利中右翼联盟于2022年9月赢得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领袖梅洛尼(Giorgia Meloni)出任总理。作为唯一受邀参加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典礼的欧洲领导人,梅洛尼与特朗普在对待公民权利和家庭观念上的看法接近,强调将政治观点置于宗教民族主义背景下,反对同

① Morgan Ortagus, “Update on U. S. Withdrawal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eptember 3, 2020, <https://2017-2021.state.gov/update-on-u-s-withdrawal-from-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访问时间:2025年4月28日。

② The White House, “With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withdrawing-the-united-states-from-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③ 刘慧:《欧洲边缘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2期,第61页。

④ 马骏驰:《欧尔班背书特朗普,匈美右翼保守力量政治联姻》,载《世界知识》,2024年第8期,第46—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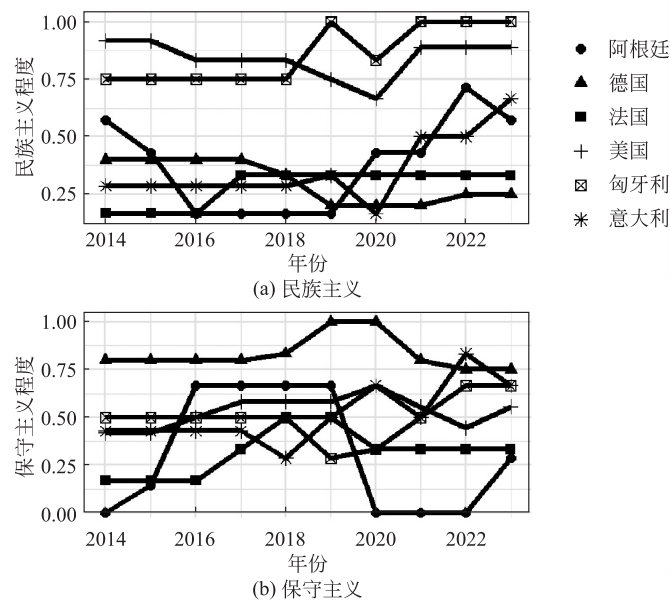


图 6 美国及其盟国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程度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V-dem 数据库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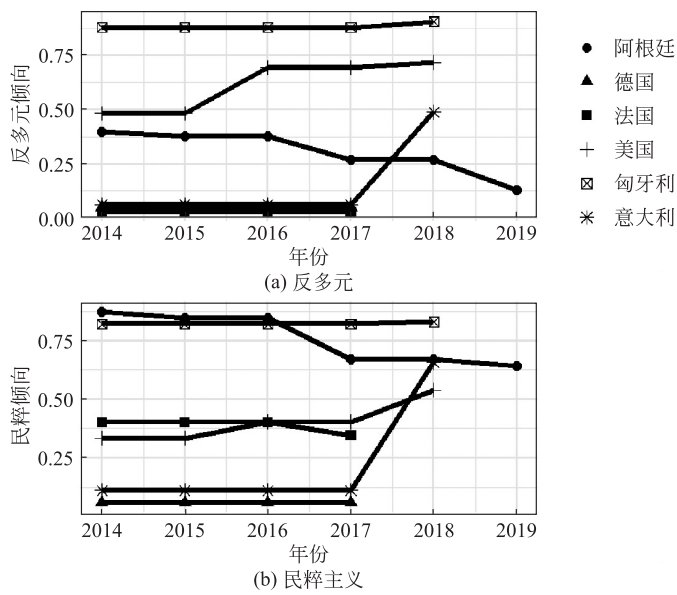


图 7 美国及其盟国执政党反多元倾向与民粹倾向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V-dem 数据库制作。

性婚姻和堕胎权,对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① 在拉美,近年来极右翼政治力量也逐渐崛起,代表性人物就是2023年底赢得大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Javier Milei)。米莱表现出强烈的宗教保守倾向,鼓吹本国利益优先,与国际极右翼联盟保持密切互动,显示出亲美、亲特朗普倾向。^② 上述三国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也表达了退出意愿,退出理由与特朗普如出一辙。2025年1月24日,意大利副总理兼交通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向众议院提交议案建议退出世卫组织,并表示“意大利不应该与(世卫组织)这个超国家权力中心打交道”。^③ 2月5日,米莱宣布阿根廷将退出世卫组织并责成外交部长启动退出程序,理由是“不允许任何国际组织干涉其主权及人民的健康”。^④ 2月6日,匈牙利总理办公室主任格尔盖伊·古利亚斯(Gergely Gulyás)表示,匈牙利可能效仿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古利亚斯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决定退出一个国际组织,匈牙利政府会考虑是否也采取这一政策”。^⑤

与上述三国相比,德国和法国的国内民族主义水平较低,执政党反多元、民粹主义倾向不明显。在特朗普政府2020年第一次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时,德国由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联盟党”)执政。联盟党虽然是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但默克尔本

① Teresa Coratella, “Pragmatism and Power: Giorgia Meloni’s Strategic Balancing Act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russels,” February 26, 2025, <https://gjia.georgetown.edu/2025/02/26/pragmatism-and-power-giorgia-melonis-strategic-balancing-act-between-washington-and-brussels/>, 访问时间:2025年4月28日。

② 李昊旻:《拉美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11期,第87—88页。

③ Elena Giordano, “Italy’s Far-right League Party Backs Trump’s WHO Exit,” January 24,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italys-far-right-league-party-backs-trumps-pullout-from-who/>,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④ 新华网:《阿根廷宣布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2月6日,来源:<https://www.news.cn/world/20250206/9a16d7ea58dd4b8ea9597266bba55fe5/c.html>,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⑤ Rory O’Neill and Csongor Körömi, “Hungary Floats WHO Withdrawal After Trump and Milei Exits,”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hungary-viktor-orban-floats-who-withdrawal-after-trump-and-milei-exits/>,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人十分推崇自由主义“民主、自由、尊重法治”价值观,鼓励多元文化,对移民持开放态度,在对外交往中强调人权议题,推动“价值观外交”,对特朗普执政风格不满,认为应对特朗普“进行教育,并让他了解一位西方政治家应该遵循的规则、规范和民主惯例”。^① 全球卫生治理事关人的健康权,自然成为默克尔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德国对此举表示遗憾,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呼吁欧盟推动世卫组织改革。^② 为应对美国造成的资金缺口,德国决定加大对世卫组织的捐助。2020—2021年,德国对世卫组织的捐款额超过10亿美元,成为世卫组织最大捐助国。德国还在柏林设立世卫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情报中心,进一步强化与世卫组织合作。^③ 特朗普两次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时,法国都是由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④执政。马克龙在外交政策上继承以“大国情结和民族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戴高乐主义传统,^⑤试图减少对美国依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争取法国和欧洲的战略自主。马克龙政府支持提高对世卫组织会费的认缴比例,增加对世卫组织的自愿捐助数额。在2022—2023年间,法国向世卫组织共计捐款1.569亿美元,是2018—2019年捐款的两倍多,成为世卫组织第五大捐助国。^⑥

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盟国行为的差异体现了效仿和改革的逻辑。特朗普之所以要退出世卫组织,主要出于对该组织效力以及美国高额支出的不满,加之其本人“我行我素”、不在乎外界评价的性格特点,但并不一定强求盟国一道退出。阿根廷、匈牙利等盟国的决策者与特朗普在意识形态、

① 克劳斯·拉尔斯著、夏晓文译:《安格拉·默克尔和唐纳德·特朗普——价值观、利益和西方的未来》,载《德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9页。

② Euronews, “Trump takes steps to withdraw US fro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July 8, 2020,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7/07/us-officially-withdraws-from-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③ WHO, “Germany Reinforces Its Commitment to Support WHO’s Work,” July 16, 2021, <https://www.who.int/news/item/16-07-2021-germany-reinforces-its-commitment-to-support-who-s-work>,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④ 2022年之前称前进党。

⑤ 王晓侠:《从戴高乐到马克龙:法国大国外交的缘起与演进》,载《外交评论》,2025年第2期,第122页。

⑥ WHO, “France: Partner in Global Health,” March 31, 2025, <https://www.who.int/about/funding/contributors/fra>, 访问时间:2025年10月18日。

性格特点、行为方式等方面接近,紧随特朗普之后几乎以相同理由宣布退出世卫组织。英国、法国等盟国则希望维护该平台,因此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后加大对世卫组织投入以弥补美国离场后可能造成的赤字。

六、结论

当一国退出或威胁退出特定国际组织后,其盟国会作何选择?退出外交对国际组织运行而言是风险还是机遇?联盟在协调对外政策时是铁板一块抑或联盟异化?既有研究主要解释了退出国实力与国际组织类型同向强化条件下盟国的政策选择。本文结合国际组织与联盟管理理论,重点关注退出国实力与国际组织类型作用方向相反时盟国的选择,分析效仿、追随与改革机制对盟国的影响。效仿是指盟国认同退出国理念、遵循退出国行为模式,主动退出国际组织或减少对国际组织投入。退出国与盟国之间意识形态越接近,盟国越可能因效仿而退出国际组织。追随是指盟国在退出国的诱惑与压力下基于成本收益考量而退出国际组织或减少对国际组织投入。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是因政治类原因退出时,盟国追随退出国的概率会上升。改革是指盟国留在国际组织中,扩大对国际组织投入、推动国际组织改革以弥补退出国造成的资金与治理赤字。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退出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时,盟国倾向于留在国际组织中并推动改革。

本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新旧更替特征明显,加强对美国退出外交背景下其盟国选择差异的学理性研究,分析美国退出外交及其盟国选择对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影响正当其时。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屡屡“毁约”“退群”,引发其盟国的不满,增强了其盟国改革国际组织治理机构的动力,这为中国加强同各类国家(含美国盟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务实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完善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虽然法国、德国等美国主要盟国当前一定程度上阻击了极右翼势力,但是2024年欧洲议会和欧洲主要国家选举结果表明,欧洲“右转”趋势已经十分明显。^①

^① 张磊:《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及其影响——新一届欧洲议会党团的结盟与竞争格局》,载《欧洲研究》,2024年第4期,第87—112页。

未来在全球范围内政党极化、社会极化程度加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扩张的风险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将来认同特朗普价值观、效仿美国“退群”的行为可能增加。此外,特朗普对盟国征收“对等关税”的行为表明其惯用讹诈和胁迫手段,不排除未来特朗普出于打击地缘竞争对手的目的而诱压盟国退出相关国际组织。